

中国通史

宋辽金西夏元史

（下）

将兵兵摇主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摇摇录

不畏强暴的清官包拯…… 员
书院的兴盛…… 源
忧先天下的范仲淹…… 苑
庆历新政 …… 员员
王安石‘ 熙宁新法 ”…… 员缘
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 圆园
宋江起义 …… 圆源
钟相杨么起义 …… 圆苑
英勇不屈的汴京保卫战 …… 猿园
“ 靖康之变 ”…… 猿缘
宋室南迁 …… 猿怨
金入主中原 …… 源园
金熙宗改制 …… 源员
金朝的衰亡 …… 缘园
南宋的建立 …… 缘源
富平之战 …… 缘苑
宋金郾城、颍昌之战…… 缘怨
绍兴和议 …… 远园
秦桧专权 …… 远缘
岳飞和岳家军 …… 远怨
完颜亮南侵 …… 苑缘
隆兴和议 …… 苑苑
史弥远擅权 …… 愿园

贾似道专权 …… 愿
潭州之战 …… 愿
南宋灭亡 …… 愿
文天祥抗元 …… 怨
誉满世界的三大发明 …… 怨
沈括的《梦溪笔谈》 …… 员
理学和著名的理学家 …… 员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 员
书法四大家 …… 员
“千古风流人物”苏轼 …… 员
陆游的爱国主义的诗篇 …… 员
辛弃疾 …… 员
铁木真统一蒙古 …… 员
统一畏兀儿和西辽 …… 员
成吉思汗西征 …… 员
蒙哥汗之立 …… 员
东侵高丽 …… 员
忽必烈夺取汗位 …… 员
忽必烈治理中原 …… 员
四等人制 …… 员
“治天下的良匠”耶律楚材 …… 员
进攻南宋和统一吐蕃、大理 …… 员
元征日本 …… 员
元征爪哇 …… 员
元成宗守成 …… 员
文宗的文治 …… 员

燕铁木儿专权…… 员怨
脱脱更化…… 员圆
元曲的繁荣…… 员缘
郭守敬的科学成就…… 员怨
黄道婆…… 员愿



不畏强暴的清官包拯

封建社会有“清官”，并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这是历史事实。统治阶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在统治集团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脸谱。清官和贪官，这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由于封建社会的动荡变乱，个人的政治生涯和生活经历都不同，各人的思想文化修养又有不同，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也会产生接近和同情人民的廉洁守法的官吏。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就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执法不阿，铁面无私。包拯就是这种人物。

包拯（998—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安徽合肥）人。他在好多地方做过知县，接触到社会下层的实际情况。他一生的立身行事，有许多特点是当时官吏所难以办到的。最突出的就是“执法不阿，铁面无私”，并能“为民请命”。他的从舅（就是堂舅）的儿子犯法，照样杀头。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为人民伸张了正气，对于皇亲国戚，他也敢于提出申斥。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包拯提出弹劾，说他是“白昼之魑魅”。为了挽救“孤贫下户”，缓解人民的疾苦，在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方面，包拯是作了一番努力的。有一年，陈州（河南淮阳）市场上的小麦，每斗实价五十文，而夏税小麦每斗要折纳麦钱一贯二百文。包拯说：这分明是“于灾伤年分二倍诛剥贫民”。这种“非常暴敛，小民重困”，必须改革。他主张按照市价来折算。

由于契丹贵族的骚扰，宋朝派包拯往河北一带调度军粮。他看到漳河流域土地肥沃，但没有很好利用。邢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河北邢台）、越州（河北赵县）等地方有一万五千多顷的民田荒废，影响了北方的粮食的供应。经过包拯的交涉，都重新开垦起来。元丰二年（庆历二年）宋、辽再次达成和议之后，包拯终始主张要加强战备。他根据历史经验，认为“以古揆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备而不为后患者。”他对当时“卒骄将惰，粮匮器朽”，而且“训练有名无实”等现象，深感忧虑。

包拯对于贪官污吏，力说严办。他认为“贪猥之徒”一经揭发，必须依法惩办，原荐举的人也应当“重坐”。针对刑狱冤滥，刑官草菅（jiān）人命的种种罪恶，他大声疾呼，主张“慎刑”。他深感当时“天下刑法，冤枉者多”，“而死者不可复生”，必须慎重其事。元年（嘉■元年），包拯出任开封府知府，前后大约一年半时间。由于他刚直清正，不向权贵低头，清理了一些冤狱，使含冤受屈者得以昭雪。三司使张方平，霸占了大量民田，经过包拯的揭发而被罢了官。

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天章阁和龙图阁是宋朝为优待文学之士而设的。宋代的文官，于本职之外往往加给殿阁学士、直学士或待制等头衔，表示他们有很高的名望。因此后来人们又称包拯为“包龙图”或“包待制”。他的地位虽高，但平日生活十分俭朴，“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与包拯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司马光，他在《涑水纪闻》这部著作中，就记录了当时京师人民关于包拯的歌谣：“关节（贿赂的意思）不到，有阎罗包老”。对包拯为官正直，铁面无私，加以赞扬。



到了南宋，朱熹把有关包拯的言行，都收录在《五朝名臣言行录》里，广为流传。

早在南宋时期，包拯断狱的故事就在民间艺人的演唱里流传。到了元朝，包拯的形象被搬上了舞台。元代戏曲文学中，包公杂剧数量很多。《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是著名的元剧名作家关汉卿的作品。那个“随朝数载”的鲁斋郎，蒙受皇帝恩宠，却没有能逃脱包公为民除害的精心布局，终于自取灭亡。《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是关汉卿的名作。剧本中的皇亲葛彪，打死百姓王老。按照封建王法，葛彪无须抵命。但当王老的三个儿子替父报仇，愤怒打死葛彪之后，包拯同情人民，他用“智”把一个犯死罪的偷马贼顶替了王老儿子的命。

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里的张别古，耿介刚直，意志坚强。他敢于斥责仓官是“害民的贼”，“于民有损，为国无益”。他临死前还叮嘱小别古斗争到底。包拯为了替张别古父子伸冤报仇，也是用“智”抢在皇帝的赦书来到之前，让小别古用钦赐的紫金锤打死赃官。仗着紫金锤行凶杀人的赃官，竟然被人民用那柄紫金锤把他打死，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最大讽刺。这是包公戏的代表作，主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表现清官包拯清正爱民，刚直不阿，能为民请命的性格特征。剧中写他在去陈州的路上，不带跟随，是一个庄稼老的身份。途中的一个妇女王粉莲唤他牵驴，他就一路上替人牵驴，谈起家常，终于从王粉莲口中了解到两个赃官的恶行。后来在接官厅，为了证实道听途说是否属实，又故意当面激怒了赃官，遭到了吊打。这两个赃官本来是到接官厅来迎接钦差大臣包待制的，结果却把包拯高吊在槐树

上。这些包公戏中包拯的形象，虽然取自历史，但其故事情节，却大都是作者的虚构，其中既有人民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尽管如此，它对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状况，特别是了解像包拯一类清官，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制裁某些损及封建制度根本利益的个别人的历史状况，还是有所助益的。

书院的兴盛

北宋承五代丧乱，统治者为谋求长治久安，注意以科举笼络士子，而忽视兴办学校之事，自开国以来，几百余年没有兴办学校，出现“士病无所于学”，而多依山林，辟舍传习讲学的状况，于是书院作为讲学授徒育人的机构应运而生。两宋书院发达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乡里兴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提到，州县之学都是奉诏所建，而乡党之学则是贤干大夫留意斯文所建，其田产和教养之规都优于学校。这种私人兴办的自给自足的书院，虽然也难免受到来自各方的侵夺，但在富庶地区，民间财力雄厚，其书院仍办得轰轰烈烈。另外，南宋书院之盛，也和其理学发展有一定关系。程颐、程颢、朱熹都是南宋的理学大师，他们的学说已被当时儒者士人所仰慕，其弟子门人为宣传师学，兴办书院，因而，南宋书院颇兴，受到理学传习的影响。由于书院是在学校衰颓时发展起来的，所以每当学校兴盛时，它就不免受到一定影响。北宋时有三次兴学之举，一次是宋仁宗庆历兴学；一次是神宗熙宁、元丰兴学；一次是徽宗崇宁兴学。不论太学还是州县学，皆设备齐全，而且又是通向仕



途的捷径，所以官府兴学，对由私人经办而补学校不足的书院是个不小的冲击。

朝廷对于办学成绩斐然之书院，亦予褒奖。太平兴国 圆年（公元 年），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知府周述说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人，乞赐九经。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至道 圆年（公元 年）赐额西京（河南洛阳）嵩阳书院。大中祥符 圆年（公元 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曹诚造舍 员愿余间，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 应天府书院 ”。大中祥符 愿年（ 员园缘年）又赐潭州（今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额，并于便殿诏见其山长周式，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仁宗年间分别赐额石鼓书院和茅山书院。这此受到赐额、赐书、赐田待遇的书院，就有了官助的因素。但总观宋代书院，主要还是民间力量兴办，书院奉一人为师，掌书院之教，称为“ 山长 ”或“ 洞主 ”，他们或是传一学派学术的大师，或是地方礼聘的有声望的学者，他们授业均不受官府的节制，极似汉代私学，甚至还沿其“ 精舍 ”的名称，如纪念朱熹的“ 教亭书院 ”，原名即称“ 沧州精舍 ”。

书院院址多选在依山傍水之名胜处，如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有林泉之胜；石鼓书院在回雁峰下，山青水秀。有人认为书院选址与寺院选址旨趣颇近，是受到禅林的影响。还有，在讲学方式上也与寺院有相同处，如寺院讲经由禅师主持，有一定仪式，而陆九渊讲学，来时鸣鼓为号，讲时升高座，弟子环绕其座听讲，讲毕返住所，弟子再往住所问难。

理学是宋代兴起的新的儒学学派，开始屡遭官方黜禁，

其传习主要靠书院。南宋时，理学分成朱、陆二大派，各有书院传朱、陆之学。由于理宗的褒奖，朱学一跃为官学，门徒颇众，多立书院，传朱学，也有的书院则传习其他学派的学说。每个书院，多以传习一派学说为主，学生多是仰慕这一学派前来，故多能刻苦求学，认真对待学问。书院虽有名师讲授，并不搞一味的灌输，而是提倡生徒自学，并注重启发学生有所创见。书院也有必要的课程设置，而且注重考核，要求学生学好本学派的学说同时要兼取诸家之长。

书院非常重视藏书，建院之初，征集图书是一大事，如应天府书院即聚书数千卷，还有一些大书院多得朝廷赐书，如太宗时赐白鹿洞书院书。南宋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除钦赐监本九经注疏外，还向各处征书，这些书都入藏于书院。书院藏书，不仅有益于其教学、学术水平的提高，而且对保存、流传图书典籍有促进作用。有的书院利用本身具备的良好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刻书，多以校勘精审，为世人称道，今传宋刻《汉书集注》即刻于白鹭洲书院。

书院从白鹿洞学馆（白鹿洞书院前身）建立到清光绪[illegible]年（[illegible]年），存在近千年，其间出现过不少著名的书院，北宋有四大书院，但具体所指，其说不一。王应麟《玉海》言，白鹿洞、岳麓、嵩阳、睢阳；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则去嵩阳取石鼓；《衡阳图志》去睢阳取石鼓。清全祖望以为《玉海》言是，其理由是石鼓至宋仁宗时才赐额，而不久又改为州学，为书院时间较短。金人南下，嵩阳、睢阳二书院被毁，仅存白鹿洞、岳麓。南宋吕祖谦新开丽泽书院，陆九渊新开象山书院，与之齐名，故称之为南宋四大书院。书院盛于宋，宋亡后它继续存在了[illegible]余



年，对我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作用。

忧先天下的范仲淹

北宋王朝到了宋仁宗时代（[illegible]），社会危机已经表面化。如何挽救北宋王朝面临的危机，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范仲淹（[illegible]）生长在南方一个清寒的地主家庭。他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姓谢，无法维持母子两口的生活，不得不带着幼小的孩子再度出嫁给一个姓朱的人家。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经历了艰苦的生活磨炼。他在醴泉寺的庙宇里读书，每天只能吃到稀粥和咸菜。后来入学念书，昼夜苦学，连续五年坚持不懈。每到寒冬腊月，夜深读书疲倦时，就用冷水泼面，振作精神，继续攻读。

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看到了北宋社会下层的黑暗面。他了解到人民的生活疾苦和要求，使他在年轻时，就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后来中了进士，就连续上书，议论时政。[illegible]年（明道 圆年），他上书反对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这一下，犹如鸡蛋碰在石头上，范仲淹一下就被驱逐到睦州（浙江淳安）去作地方官。过了一年多，又改任苏州知府。当时正遇上大水灾，民田不能耕种，范仲淹亲自规划农田水利，取得了成绩。[illegible]年（景[illegible] 圆年），他升任礼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知府。当时朝廷里仍然是吕夷简掌权。他们扩大私人势力，打击新进人物。范仲淹不畏权贵，上书批评时政，主张选择贤能，整顿朝廷吏治。结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又一次遭到吕夷简集团的排斥而被外调。

后来范仲淹被派到西北边疆防守西夏侵扰。几年中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西北一带的“羌、汉之民，相踵归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军事上，范仲淹“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经过欧阳修等大臣的推荐，元昊称帝前夕（庆历猿年）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这一年正是山东地区爆发王伦起义。第二年（元昊称帝年），他就向宋仁宗皇帝提出十项政治改革的方案。方案的内容包括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等，主要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的改革。

在政治上，范仲淹主张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清除贪污犯法分子，限制特权势力。他认为任用官吏，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考试的科目应当先是“策论”，后是“诗赋”。提拔人才，首先要知道他对国家大事的基本态度，是不是关心“经国王霸之业。”文学素养应放在次要的地位，要把热心于“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而又有真才实学的“寒士”（下层地主知识分子）提拔上来。他还主张政府的法令一旦公布，就必须严格执行。赏罚必须分明，“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罚”。他深有感慨地说：“国家之衰，莫大于乏人”。如果没有正直奉公的人才，就是有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施行。

为了整顿吏治，他审阅了全国各路的地方官政绩，撤换了一批无能的官吏。当另一位大臣富弼看见范仲淹在职官簿上勾去了一批“监司”（就是各路的转运使等官吏）的名字



时，心里有些不忍。他对范仲淹说：勾去这些人的名字倒很容易。要想一想，这些人丢了官，岂不是全家人都要痛哭流涕吗？范仲淹当即回答说：与其让这些坏官危害一路之内的老百姓，叫一路人都哭，不如让他们一家人去哭吧。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在经济上，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主张“ 劝课农桑 ”，认为这是“ 富国之本 ”。他要求各地方官必须随时向朝廷报告兴修水利的建议和办法，陈述发展农业的意见，积极修筑堤堰渠塘，减轻漕运负担，恢复江南圩田。范仲淹认为，如果各级地方官能真心实意讲求农桑和水利，不要几年，就可以减少饥荒。他还主张减轻徭役“ 以宽民力 ”，不应当服差役的人，都应当让他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

在军事上，他主张军队要搞生产，要实行“ 兵在于民，且耕且战 ”的兵农合一制度。一年内士兵三季务农，一季训练，这样，才能节省军费开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认为军事将领应当从士兵中提拔，要真正做到“ 择将于伍 ”，提拔“ 智勇之人 ”充当统帅。北宋有一员名将叫狄青，就是范仲淹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升为国家的大将。

范仲淹的“ 庆历新政 ”，在当时来说是一个远见的政治改革方案。虽然这个方案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当权的保守派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整顿吏治方面，限制了权豪势要的特权，因此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他们无中生有，颠倒是非，诬陷范仲淹引用私人，勾结朋党。甚至诬告范仲淹要想废黜皇帝，把一切捏造的罪名统统加在他的身上。范仲淹的改革，不到一年就失败了。元昊缘年（庆历 缘年），他被赶出中央朝

廷，调到西北边疆。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但他敢于向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势力挑战。他的言行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积极的影响。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他提倡“养民”、“重农”，使人民能够安心生产。他说：“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这种“修农政”、“足衣食”的思想，把农业生产放在治国的重要地位，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范仲淹的政治方案没有得到实现。他并没有灰心。他仍然希望北宋王朝的政治能有所改善，能出现一个开明的政治局面。他的一位好友滕子京，在防御西夏的战争中作出过贡献。他的政治思想同范仲淹是接近的，都是追求革新和进步。当滕子京被人诬告，贬官到岳州（湖南岳阳）以后，仍然对地方政治的改革作出巨大的努力。庆历六年（庆历远年）的秋天，范仲淹应滕子京的要求，写了一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范仲淹写了这么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是范仲淹勉励滕子京，同时也是鞭策他自己的。意思是说：一个有作为的人，要把目光看得远一些，应当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首先要把国家安危的重任担当起来，忧国忧民，不能只顾个人的私利，应当有“许国忘家”的思想。

继范仲淹之后，苏轼也向宋仁宗皇帝多次上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他认为必须限制权豪显贵，遏止兼并势力的发展；要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才；要节约国家财政费用，调整赋税，量入为出；要清除贪吏，改革时弊；要寓兵于民，制定军制，训练军队，加强国防力量。这些主张对改变当时北宋的政治局



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苏轼的改革主张，对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是有很大影响的。

范仲淹和苏轼的政治改革主张，由于受到阶级地位的限制，必然带有消极和妥协的因素。最明显的就是对势官富姓兼并势力的斗争，不够坚决，没有提出如何满足贫民的土地要求。对于当时最尖锐的土地问题，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

庆历新政

宋王朝到中期所面临的形势是内忧外患。国内方面，官员过多，并且官俸优厚；不重视武将却大批养兵；再加上皇室的挥霍无度，造成财政紧张。官僚地主又争相兼并土地，还隐匿土地数目不纳税。官方将税额摊到少地和无地的广大贫困户头上，使得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外方面，对辽、夏战争的失败，迫使宋朝采取媾和政策，每年向辽、夏贡纳大批银、绢、帛、茶等财物。这些贡品来自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它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本已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更难支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发展的危机局面，促使部分较清醒的士大夫呼吁宋廷革除积弊，稳固统治。范仲淹就是其中较突出的一员。

天圣猿年（员源猿猿年），范仲淹曾上书反对恩荫泛滥的不良风气；天圣缘年（员源猿源年）上疏批评宋朝腐败的吏治和松弛的武备。两次上书，均未引起当权者的重视。天圣苑年（员源猿怨年）范仲淹“讥切时政”，得到尹洙、欧阳修的支持。三人皆被贬。此外，如宋真宗初年王禹偁要求改革减少

冗官冗兵、严格选举等。宝元 圆年（元昊怨年）宋祁上疏主张裁减官兵、减省开支。庆历 圆年（元昊猿年），仁宗赵祯面对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对夏战争的失败，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 欲更天下弊事 ”。

范仲淹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综合自己多年来的改革思想，于庆历 猿年（元昊猿年）怨月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呈给宋仁宗，作为他改革的基本方案。他所列十事分别是：

一、明黜陟。宋初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不限朝廷内外各官，不论才能和政绩如何。这种凭年头升迁的办法，使许多素餐尸禄的人坐至高官。贤才稍有差失，反而被排挤诬陷。明黜陟要求：京官有“ 大功大善 ”，僚庶有“ 高才异行 ”，地方官“ 善政著闻 ”者，不受磨勘之限，可破格升迁。在京“ 重难库务 ”的京、朝官，三年即予升迁。在京其它机构的官员须五年方可升迁。老疾愚昧和任内犯有公罪或私罪者，另行处置。这项措施旨在改变官吏因循守旧的习气。

二、抑侥幸。宋初以来实行的恩荫制度，使贵族近亲官僚滥进的现象日益严重，做学士以上官者，靠恩荫制度，经过 圆年，一家兄弟子孙可有二十人出任京官。为限制毫无节制的恩荫制度，范仲淹建议：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监以上官，遇南郊祭祀可各奏荐子孙。对其它京、朝官和地方官，提出条件限制其恩荫子孙，以免官僚子弟“ 与孤寒争路 ”。又规定贵族子弟不得补馆阁职；进士充任馆阁之职，也要经过考试，择优录用。



三、精贡举。宋朝专以诗词歌赋取进士，以默写经文及注疏考诸科举人。所选拔的人，有才能和器识者很少。范仲淹主张改变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教士人应以治世之业为主；考进士时，策论优于词赋；考诸科时，经旨重于经文和注疏。

四、择官长。范仲淹不满意宋政府在委任地方官时，不问贤愚而专以年限为标准的做法，为避免不胜任的地方官鱼肉百姓，范仲淹请求：委托中书、枢密院等推选，举荐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各一定的名额；逐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各同举知州，知州、通判同举知县、县令一定的名额。这样，举主多的人优先差用。仍令审官院、流内铨考察所用地方官的得失功过。

五、均公田。这使官吏保持廉洁，防止其贪赃枉法，范仲淹主张地方官中，没给职田者补给，职田不均者均之。用职田补给官员俸禄收入，供他们衣食、婚嫁、丧葬之用。

六、厚农桑。范仲淹认为国家不提倡务农桑，则粟帛常贵，百姓生活艰难，官方府库空虚。为改变这种情况，范仲淹请求在每年秋天，令诸路转运司于所辖州、军吏民之中，广开农桑利害的言路，据此来开河渠或修筑堤堰陂塘，让各州、军选官主管该事，每年春闲时动工，不误农时为宜。

七、修武备。宋初，为稳固中央统治和保证中央集权，重兵屯于京师。仁宗时因对西夏战争，大军调往西北。范仲淹担心京师空虚，难以应付仓猝事变。因此建议：密令中书和枢密院查军队所缺之数，在京畿附近招募强壮之人五万，帮助军队保卫首都。募来之人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以节省军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